



◎李建树

我的日记断断续续的,基本上是无事不记,有事简记。载体也是多种多样,有的随手记在工作笔记本或会议记录纸上,有的则直接输入电脑文库,所以真要查找一点什么的话,也就只有我自己知道在何处了。

比如我今天要说到的一则日记,就是记在我出差专用的那一个工作笔记本上的。原文如下:

2003年4月21日,阴。杭州星洲宾馆。出席省作协全委会二次会议。

上午开会,下午与会人员星散,未开成。“非典”来也。

关于“非典”之前只听闻广州那边闹得比较凶,我们这边相对太平,所以大家并不怎么在意。曾听在市级机关工作的一位女干部讲笑话,说她头晚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,有一戴口罩的人弯过身来问她旁边的座位是不是有空,把她吓得够呛!

晚饭之后想打的去女儿家看看外孙闹闹,在宾馆门口见舟山的一位女作家戴着口罩也在等车,我心里觉得怪怪的:是她自己发热了,还是怕我感染“非典”了?真是麻杆子打狼两头怕呀,于是避开了。

第二天上午正式开会。黄亚洲来到会场,外地委员见了照例礼貌地想与之握手致意,不料一向随和的他此时却只是抱拳一揖,说:“‘非典’时期不握手!”

也正是在这时,关于杭州发现两例“非典”病人的传言也多了起来。综合起来大致情况为:杭州某报的一位总编辑及其家人,与在北京已染病的阿姐一家人相约一起开车去武汉扫墓,结果被传染,返回杭州后即被强制收进医院住院隔离……

他们的住所以及所在的小区也已被封闭、隔离。黑色大字标题的《都市快报》翩然而至。传言被证实……

形势正是这样慢慢地紧张起来的。但随着主持人的热情招呼,各级领导依次登上主席台,大会还是行礼如仪地隆重开幕了。

会议的第一阶段是举行2002年度“浙江青年文学之星”颁奖仪式。会场的火热气氛暂时驱散了一些由“非典”所带来的阴影。

会议中间休息时,我的手机响了。是荣荣打来的。她说:“你还在杭州开会啊,还不快回来,杭州出‘非典’了晓得不?你想把‘非典’带到单位来呀?”

到底是信息社会,消息就是快!当然这只是同事之间的一个玩笑,我并不在意。

到吃中饭时,气氛真正紧张起来了,因为有很多外地委员在大声地发牢骚,提意见:“这个时候还开什么会啊,来这么多人,人多传染的风险更大。”有人说要多喝酒,要学会抽烟,据广州那边的人说,老烟

◎潘玉毅

一次参加讨论会,碰到一位老先生,他有两个女儿,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,一个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,所有人都觉得他的教育很成功,想让他聊聊育儿经验。他说:“我工作也忙,平时对孩子的管教很少。她们能有今天的成绩,都是她们自己的努力。”后来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,他说:“不过我有一点做得还是可以的,就是不管再怎么忙,我都会抽时间陪她们,她们看书我也看书,哪怕看不进去,装也会装着看书的模样。”

又一次,我在聚会中碰到一位诗人朋友,也谈及她的育儿经。她女儿酷爱音乐,而且在音乐方面极有天赋,但孩子心性,难免贪玩,她大有“恨铁不成钢”的意思,很想揍上一顿,却被她老公阻止了。她老公把女儿叫到跟前,跟她说:“学琴和玩你只能选择一样,要玩,就不能碰琴。”女儿答应了,他也依约放任女儿去玩,然后自己每天在钢琴房里演奏,好几次,女儿想来学,都被他以先前的“约法三章”为由拒绝了。一段时间之后,她女儿终于弃玩选了学钢琴。可见,在很多事情上,身教比言传更重要。

但是做父母的,大多做不到这一点。我们的家长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未了的心愿寄托在孩子身上,全

枪不会得“非典”。那天午餐的白酒特别受欢迎,不会喝酒的人和女同志也拿杯子来倒一点,说:“消毒也好啊!”因为听好多委员在说吃好饭就准备开路,我脑子里也转开了:要不下午争取第一个发言,然后抽身而退,提早回宁波?

下午二点,我准时来到会场。哈,会场里冷冷清清的,与会人员真的“星散”了。

我找到黄亚洲书记,求他在各地、市交流时安排宁波头一个发言。

亚洲说:看看吧,下午的会能不能开成还难说呢。

真的,又等了会儿,看看再没人来了,各地、市交流的项目只得取消。我也慌了起来,赶紧去房间收拾东西开路。

匆匆赶到汽车车站,只见候车室里已是白茫茫一片,人人都戴了口罩,就东找西找,花5元钱也买了一只戴起来。

人的心理真是有点怪,在那样的场合,口罩戴与不戴,感觉竟然大不相同。一蒙上薄薄的那几层纱布,再坐在人群中候车时,我的心里竟也有了一种安全的感觉。

车到宁波南站,便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天地——只觉着我们宁波的天特别蓝,空气特别清新。看周围一个个来去自如的人群,我这个口罩男成了另类,于是赶紧摘下藏起来。

事实上,我们宁波抗击“非典”的战斗也正是在那一天打响的,这还是我此后参与编辑《难忘的日子——宁波市抗击“非典”》(2003·4·21-6·10)纪实一书时才了解到的。那时“守望相助”成了热词,

而这之后的经历我们都已牢记在胸了——那是一段多么刻骨铭心的经历啊!奇怪的是,在此期间,我会时不时地想起4月21日“逃离”杭州的那一幕。五一节后第一天上班,按上级部署,我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问同事们节日期间都去过哪里,家里有没有来过外地客人?这时我会忽然想到4·21,想到荣荣的电话,想到我如果现在从杭州回来,那是不是就先得测一下体温,如有异常就得去居委会报到,然后被“隔离”观察14天呢?

想起海明威《丧钟为谁而鸣》扉页上的那一段题词:“谁都不是一座岛屿,自成一体;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。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,欧洲就少了一点;如果一个海角、你朋友或你的庄园被冲掉,也是如此。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,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。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,它为你而鸣!”

这一段话就像是专为多少年之后才于今年所发生的“非典”而写。

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:“非典”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,但也教会了我们许许多多。就如现在我们听见“艾博拉”就少了当年的那一种恐慌与无助,毕竟社会和科学也在进步啊。

不管这样是否合情合理,而且在他们心中,“只许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”是很寻常的,许多家长一边告诉孩子不要看电视、不要玩电脑,一边自己看得津津有味、玩得兴致盎然。

模仿是孩子的天性,很容易有样学样。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父母要为孩子树立榜样。如果不想孩子做什么,自己就得先不做。反之亦然。你想让孩子弹钢琴,自己就得站在钢琴边上;你想让孩子学画画,自己先得拿起笔墨——哪怕很多事情我们都不会,装也得装着。

可惜现在有很多家长不但不能成为孩子的好榜样,甚至还要孩子为他们更正错误。有些家长习惯乱扔垃圾,好像天大地大,到处都是自己的垃圾箱;还有的精于“中国式过马路”,凑够一撮人就开始闯红灯——每当这时,说不可以的往往都是孩子。不久前,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幅漫画,画上是母子两个,妈妈一边把瓜子壳吐得满地都是,一边教育孩子:“妈妈常说讲卫生,你怎么不听?”孩子一脸茫然,额头上的汗都滴下来了。

《庄子》云:“语之所贵者意也,意有所随。意之所随者,不可以言传也。”孔子说得更直白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还是以大禹治水作比喻,大禹为治水,三过家门而不入,首领都这样了,其他人还好意思偷懒吗?人同此心,听其言还得观其行,只有言行一致,才能真正让人觉得“人言不欺”,并深以为然。

一
则
日
记

名家走笔

总第 5850 期

投稿邮箱: essay@cnb.com.cn

摄影 朱坚

言
传
还
须
身
来
教

有所悟

城市写真

穿着红线衫
的小女孩

◎陈庆杰

我有时会坠入冥想,却不知道这冥想的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

那一条弄堂横贯菜场的两个北门,一溜全是店铺。水果行的隔壁是油炸点心店,点心店往前就是蔬菜行;这边有卖猪肉,还有卖海鲜的,卖香烛的。闭了眼,像电影似的一幕幕都在我眼前飘过,仿佛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沉入冥想的时候,喧嚣的市声便纷至沓来,准确无误地送入耳中,生活的影子便鲜活地浮现在记忆里了。

有时会坠入冥想,当我骑着车幻想自己像一只鸟一样在空中滑翔,像一把剑一样撕开马路上的风的时候。差别只在于瞬间还是片刻,相同的是都会因为斜刺里蹿出行人或驶来车辆而戛然而止;相同的是内心都会冒出无声的歉意。

可是,在沉入冥想的时候,心中的直觉有时一如一位不速之客,给我预警。

像今日这个非常普通的傍晚,我买好明天必需的一些蔬菜,边骑着,边盘算着是否还有什么遗漏的,来到了三岔路口。左转弯时几乎都没怎么去思考,但是我必须有所准备,被遮挡的视线暂时没法告诉我前方存在着什么。我只是清楚地知道,前方的弄堂更狭小,而且在这条路的右侧经常停放着菜场的运输车,也因此在这里骑行常常左躲右闪,必须像穿花绕蝶一般斗折蛇行,才能保证安然无恙。

转过弯十米开外有两个妇女正在步行,彼此间隔3米。大约可以从中间一闪而过吧,但我还是犹豫着观察了一番。走在左侧的约莫五十出头,右侧的则四十不到,她们俩甩开两臂像两只臃肿的白鹅摇摆着朝前赶路。在右侧妇女的左手边,还有一个穿着红线衫的小女孩一路小跑着,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跟哪个妇女说话,偶尔伸出稚嫩的小手想去挽住右边的女人。

小女孩或许玩得很快乐,鲜红的背影像一团燃烧着的火苗,又像春天草地里的一朵小红花。她大约还只有5岁光景。直觉,或者说是一种预感,告诉我必须减缓速度,因为在仅有5米的距离内恐怕无法瞬间刹车——假如小女孩转向朝左侧的妇女奔过去了呢?心念急转之间,我与小女孩的距离已慢慢缩小到了3米之内,却只见那个鲜红的小小身影果真突然转向,小火苗朝左侧的妇女快速地飞奔而去,她竟然瞧也不瞧身后飞驰而至的究竟是什么!在两个大人的惊呼声中,我缓缓地停在小女孩的身后,已经近在咫尺了呢。我低下头,看着那一张稚嫩的此刻却有点害怕的脸温和地笑了笑,她也正望着我。

而当我再次出发的时候,耳边随风送来忽高忽低的大人叮嘱孩子的声音。